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选

中 册

安 徽 大 学

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评论选

中 册 目 录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朱自清 (1)
试论《倪焕之》的思想意义·····	任天石 (7)
论闻一多和冯至的诗·····	何其芳 (18)
闻一多的诗·····	臧克家 (27)
徐志摩论·····	茅 盾 (46)
田汉戏剧的艺术特色·····	陈瘦竹 (65)
论《子夜》·····	刘绶松 (72)
《蚀》和《子夜》的比较分析·····	乐黛云 (111)
试论茅盾的短篇小说创作·····	黄侯兴 (133)
论巴金的小说·····	王 瑶 (158)
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樊 骏 (211)
愿你尝尝这颗仙桃·····	税海模 (236)
《雷雨》和《日出》的结构艺术·····	陈瘦竹 (243)
“最残酷的爱和不忍的恨”·····	钱谷融 (271)
“夏天里的一个春梦”·····	钱谷融 (282)
我爱《原野》·····	唐 弢 (293)
蒋光慈的创作道路·····	田本相 (303)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朱自清

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地写”的作品。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

圣陶的身世和对于文艺的见解，顾颉刚先生在《隔膜》序里说得极详。我所见他的生活，也已具于另一文。这里只须指出他是生长在一个古风的城市——苏州——中的人，后来又在——一个乡镇——角直——里住了四五年，一径是做着小学教师；最后才到中国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市，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直至现在。这二十年来时代的大变动，自然也给他不少的影响：辛亥革命，他在苏州；五四运动，他在角直；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却是他在上海亲见亲闻的。这几行简短的历史，暗示着他思想变迁的轨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思想变迁的轨迹。

因为是“如实地写”，所以是客观的。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极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笔锋也不常带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对话及作者关于人物或事件的解释里，往往出现，特别在初期的作品中。《不快之感》与《啼声》是

两个极端的例子。这是理智的表现。圣陶的静默，是我们朋友里所仅有；他的“爱智”，不是偶然的。

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思潮；但他能用艺术表现，便较一般人为深入。他从母爱性爱一直写到儿童送一个小蚬回家，真算得博大周详。母爱的力量在牺牲自己；顾颉刚先生最爱读的《潜隐的爱》（见顾先生《火灾》序），是一篇极好的代表。一个孤独的蠢笨的乡下妇人用她全部的心与力，偷偷摸摸去爱一个邻家的孩子。这是透过一层的表现。性爱的理想似乎是夫妇一体，《隔膜》与《未厌集》中两篇《小病》，可以算相当的实例。但这个理想是不容易达到的；有时不免来点儿“说谎的艺术”（看《火灾》中《云翳》篇），有时母爱分了性爱的力量，不免觉得“两样”；夫妇不能一体时，有时更免不了离婚。离婚是近年常有的现象。但圣陶在《双影》里所写的是女的和男的离了婚，另嫁了一个气味相投的人；后来却又舍不得那男的。这是一个怪思想，是对夫妇一体论的嘲笑。圣陶在这问题上，也许终于是个“怀疑派”罢？至于广泛地爱人爱动物圣陶以为只有孩子们行，成人是只有隔膜与冷酷罢了。《隔膜》，《游泳》（《线下》中），《晨》便写的这类情形。他又写了些没有爱的人的苦闷，如《归宿》里的青年，《春光不是她的了》里被离弃的妇人，《孤独》里的“老先生”都是的。而《被忘却的》（《火灾》中）里田女士与童女士的同性爱，也正是这种苦闷的另一样写法。

自由的一面是解放，还有一面是尊重个性。圣陶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写一个农妇的。对于中等家庭的主妇的服从与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春游》（《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两封

回信》里说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他后来在《未厌集》里还有两篇小说（《遗腹子》，《小妹妹》），写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女子压迫的力量。圣陶做过多年小学教师，他最懂得儿童，也最关心儿童。他以为儿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我们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但写得好的是《低能儿》，《一课》，《义儿》，《风潮》等篇；前两篇写儿童的爱好自然，后两篇写教师以成人看待儿童，以致有种种的不幸。其中《低能儿》是早经著名的。此外，他还写了些被榨取着的农人，那些都是被田租的重负压得不能喘气的。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揪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圣陶极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假如上文所举各例大体上可说是理想的正面或负面的单纯表现，这种便是复杂的纠纷的表现。如《祖母的心》（《火灾》中）写亲子之爱与礼教的冲突，结果那一对新人物妥协了；这是现代一个极普遍极葛藤的现象。《平常的故事》里理想被现实所蚕食，几至一些无余；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烦闷的表白。《前途》与此篇调子相类，但写的是另一面。《城中》写腐败社会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疑忌与阴谋；而他是还在准备抗争。《校长》与《搭班

子》里两个校长正在高高兴兴地计划他们的新事业，却来了旧势力的侵蚀；一个妥协了，一个却似乎准备抗争一下。但《城

中》与《搭班子》只说到“准备”而止，以后怎样呢？是成功？失败？还是终于妥协呢？据作品里的空气推测，成功是不会的；《城中》的主义公大概要失败，《搭班子》里的大概会妥协吧？圣陶在这里只指出这种冲突的存在与自然的进展，并没有暗示解决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写《桥上》与《抗争》，他似乎才进一步地追求了。《桥上》还不免是个人的“浪漫”的行动，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抗争》却有“集团”的意义，但结果是失败了，那领导者做了祭坛前的牺牲。圣陶所显示给我们的，至此而止。还有《在民间》是冲突的别一式。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别人论这些作品，总侧重在题材方面；他们称赞他的“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描写”。这是并不错的。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写城市中失业的知识工人（《城中》里的《病夫》和教师的苦闷；他写战争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村镇人物的利己主义、提心吊胆、琐屑等（如茅盾先生最爱的《潘先生在难中》及《外国旗》）。他又写战争时兵士的生活（《金耳环》）；又写“白色的恐怖”（如《夜》，《冥世别》——《大江月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纪事》）。他还有一篇写“工人阶级的生活”的《夏夜》（《未厌集》）（看钱杏邨先生《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见《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等二卷）。他这样“描写了广阔的世间”；茅盾先生说他作《倪焕之》时才“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似乎是不对的（看《读〔倪焕之〕》，附录在《倪焕之》之后

面)。他诚然“长于表现城市小资产阶级”(钱语)，但他并不是只长于这一种表现；更不是专表现这一种人物，或侧重于表现这一种人物，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这时期圣陶的一贯的态度，似乎只是“如实地写”一点；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长篇作品《倪焕之》，茅盾先生论为“有为之的小说”，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记》里还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这可见他所信守的是什么了。这时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观的冷静（初期作品如《饭》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发精炼，写实主义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这一篇最可代表，是我所最爱的。——只有《冥世别》是个例外；但正如鲁迅先生写不好《不周山》一样，圣陶是不适于那种表现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修译）里说写实主义有三种。圣陶的应属于第二种，所谓“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在这一点上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可以承认。

我们的短篇小说，“即兴”而成的最多，注意结构的实在没有几个人；鲁迅先生与圣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们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谨严而不单调的布局。圣陶的后期作品更胜于初期的。初期里有些别体，《隔膜》自颇紧凑，但《不快之感》及《啼声》，就没有多少精彩；又《晓行》，《旅路的伴侣》两篇（《火灾》中），虽穿插颇费苦心，究竟嫌破碎些（《悲哀的重载》却较好）。这些时候，圣陶爱用抽象观念的比喻，如“失望之渊”、“烦闷之渊”等，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或浮浅了。他又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风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释的地方，往往太正经，又太多。

如《苦菜》（《隔膜》中）固是第一身的叙述，但后面那一个公式与其说明，也太煞风景了。圣陶写对话似不顶擅长。各篇中对话往往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这便在后期作品中也不免。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他最擅长结尾，他的作品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

（十九年七月，北平清华园。）

（选自《朱自清序跋书评集》，三联书店
1983年版）

试论《倪焕之》的思想意义

任天石

叶圣陶的《倪焕之》在新文学史上最早成功地塑造了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了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本质特点。但迄今为止不少评论却认为“倪焕之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①，是“把改良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②的，作品的主题就是“通过倪焕之半生经历的描写，深刻地否定了改良主义”③。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改良主义有特定的时代和阶级内容，它是指工人运动内部一种以毫不触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少许改良代替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潮流，在中国近代史上，则借以说明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改革的政治性质。而倪焕之的道路与此并不相同。首先，与改良主义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相反，倪焕之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学生时代他就爱读秘密书报，爱听进步演讲，立下了反抗满清统治，争取民族自强的志向，可见，他的最初觉醒，就是以反对封建专制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中更表现出他对腐朽的封建统治的强烈反对；后来他所以主张改革封建教育，也正是为了促进民众觉悟，使“人人明白”和“看清”封建复辟的严重危险，以不再演“第二回第三回的帝制把戏”。这就和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明确划清界限。其次，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以教育的改良反对社会革命，畏惧阶级斗争和革命流血，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而倪焕之的教育活动却是服务和从属于社会革命的总目标的，他对重大政治

斗争总是怀着强烈的政治热忱和献身精神。五卅之后自不必说，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迫切地想往着“一面旗子也好，一颗炸弹也好，一支枪也好”，只要“接到手就往前冲。”在震撼中华大地的“五四”风暴中，他虽僻处江南水乡，但他的“愤激似乎比任何人都厉害，他的身躯虽在南方，他的心灵却飞驰到北京”，他强烈地“愤恨执政的懦弱和卑怯，列强的贪残和不义”，他冒着激雨发表演讲，“竭尽了可能的力量”呼唤“大家来担负救国的重任吧！”倪焕之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与当时的改良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当然，作为摸索前进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倪焕之在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唯心论的影响，因此，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报国无门的懊丧和苦闷中，曾有“一切的希望在于教育”的愤激之词。时代赋予他的这种局限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得到克服，到上海参加革命活动后的一个突出进步，就是他愈加清醒地认识和克服这一局限，逐步自觉地把教育事业同革命全局结合起来。这种局限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探究如何改造社会过程中的产物，但与根本取消与反对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倪焕之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有两点，一是“着着实实发展儿童的‘性’，长养儿童的‘习’。”为此，主张尊重学生，废止体罚和训斥，实行“诚意感化”。这体现了尊重人的本性，维护人的尊严的个性解放要求，其目的在培养儿童的民主精神和独立性，这正是新兴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它对于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无疑是一大进步。有些评论责之曰“抽象的，超阶级的相互尊严、相互怜爱的‘人类之爱，’”④，以证明这种教育思想的错误与反动，这就离开了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对教育的不同要求。其原则之二是“学习与实践的合

一”，为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境界”。为此，他们把举办农场、工厂、戏院，“教学生种地、做工、演戏、开会”作为新教育试验的重点。这种学习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的结合，打破了脱离实际死读书的封建教育形式，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思想，具有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创造才能的积极意义。总之，倪焕之早期教育活动体现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⑤，是五四之前“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⑥的一部分。

倪焕之的前期政治态度和教育活动表明，他走的不是一条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道路，而是一条反帝反封建立志革新中国的民主主义道路。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倪焕之适应了历史时代和革命性质的这一转变。他直接投入了威武雄壮的群众斗争，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五卅斗争中，他冒雨上街“疯狂似地只顾演讲”，“全身心沉醉于演讲的状态中”，“他恨不得把这颗心拿给听众看”。他以“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兴奋之情，犹如一个“临阵的战士”，组织学生欢迎北伐军，分发慰问品，参加各种集会。他从无私无畏的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弱点，决心“学习他们那么朴实，那么劲健，那种不待多谈而行为来表现的活力”。他的思想已经达到那个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较高水平。至于他的醉后呓语和病中幻觉，虽然其中确有不少消极迷茫的成分，但这种连当时一些革命党人都不能避免的感情波动，对于他这样正在成长中的知识分子更不必苛求。何况其中更有他对自己一生的沉痛总结，对自身弱点的深刻认识和批判，表现了他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正确理想：“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同我一样的人，当然也没有一个中用！成功，是不配我们受领的奖品，将来自有与我们

全然两样的人，让他们去受领了！”他对王乐山、殷女士和工人形象的幻觉，则又表现出他对革命战士的敬重和对禽兽不如的敌人的憎恶，我们不应以其中个别内容来否定主人公这一阶段为大量的也是最重要的斗争实践所证实了的突出进步。

确实，倪焕之曾经对自己的前期活动作过激烈的否定，给自己戴过“为教育而教育”的帽子。但他这些过激言词一方面表现了他勇于否定自己的自我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确实表现出他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倾向，这往往是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的通病。评价艺术形象同评价现实中的人一样，其主要依据不是人物自身的宣言而是其行动。完整地、全面地考察倪焕之一生的斗争实践，我们认为作品是在旧民主主义末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勾勒出了我国进步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走向人民革命的历史道路，从而肯定了他们在各个历史阶段不可磨灭的革命地位、战斗业绩和历史作用，这是作品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思想成就。

倪焕之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些评论认为通过这倪焕之这个形象，“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⑦。与此相反，我们则认为作品通过倪焕之的形象描绘以及他与身边人物的各种联系，主要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许多可贵性格，这正是他们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发挥先锋和桥梁作用，而区别于封建主义或帝国主义反动文人的基本思想素质。

倪焕之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是有理想，有抱负，勇于探求，立志改革。他不是与世浮沉随波逐流的庸碌之辈。他从小就立下了“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事的志气，辛亥革命中更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中学毕业后虽一度陷于苦

闷，但满腔的爱国理想和严肃的生活态度不允许他昏昏耗耗，敷衍自己，由于一个同事的感染和教育理论的影响，终于发现教育也可以成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自此他就立志在辛勤的耕耘中，把自己的爱国心血点点滴滴地浇灌在这块祖国的苗圃里。后来的教育试验更是闪耀着理想的光彩，正如他所说：“教育是培养‘人’的，——‘人’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人’应该怎样培养？——这非有理想不可。”正是这种理想鼓舞他排除和逾越了重重阻拦，坚信“理想的境界就在我们的前途，犹如旅行者的目的地那样确实。昂着头，挺着胸，我们大踏步向前走，……我们将接近希望的本身。”随后，他又怀着新的探求的热情到上海开始了新的战斗。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理想，并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不断前进的一生。

这一性格特征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对理想家庭的追求上。他与金佩璋的结合，最初确是基于理想与事业的结合。金佩璋本是一个有较强烈妇女解放要求和民主精神的女青年，对教育充满热情和幻想。倪焕之和这样一个思想新进、品貌超人的新女性的结合，冲破了腐朽的封建门第观念，实现了爱情与事业相结合的婚姻，是他的生活理想在一个方面的胜利。他把建设理想家庭的希望寄托在妻子身上，而她身上的进步性是有限的，由于“女性的传统性格”的影响，由于她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反封建斗争的洗礼，使她很快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成了一个小市民气息浓重的家庭少妇。尽管理想家庭已化为泡影，但倪焕之却始终未放弃对理想家庭生活的追求，他竭力激励妻子上进：“你不能同书籍分手，你不能！你将来仍旧要在学校里任事！”五四演讲回家后，他热情地引导她把目光放到国家大事上来；为着投入新的斗争，他毅然离开温暖的小窠奔赴上海；直到临终之际，仍想念着她“当年乌亮亮的一对眼睛”，“憧憬着她

“站在洒着急雨的马路中间，…高举两臂，仰首向天，象个勇武的女神”的英姿。可见他对金佩璋的热望，对理想家庭的追求，是至死不渝的，这就从一个侧面突现了他的理想性格。

倪的这一性格，也是在同不知理想为何物的金树伯和一群教员的对立中显示出来的。地主阶级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养成了金树伯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玩世不恭的生活哲学，他生活卑琐庸俗，思想陈旧腐朽，就象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在大时代排出的生活污水中浮荡。小说一开头就展示出倪焕之与他那种把一切当作游戏的人生哲学的对立，倪的那段切中金树伯思想要害的话：“他只有一个狭小的现实世界，一个家庭，一份家产，一个乡镇，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表示他只是一个狭小世界里的人民”。这有力地反衬出倪焕之理想的高远和胸怀的宽广。倪焕之用理想的光辉把自己的事业照耀得那么光彩灿烂，而徐佑甫、刘慰亭、陆三复、李毅公这群同事却把学校“看作一家商店”，觉得“教育的理论不是花言巧语聊资谈助，就是愚不可及，自欺欺人”，因而对于倪的教育试验不理解，看不惯，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背后拆台，或者公然嘲讽。小说以他们的心灵世界相对照，突出了倪焕之理想性格的高贵与坚强；虽然“少数的薪水，仅能困苦地维持母子两人的生活，对于这一层，他向来不以为意，因为物质以外另有丰富的报酬。”因此他能在校内外反对势力的夹攻下把教育试验坚持下去。

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是与对现实的坚决反抗结合在一起的。对反动势力的不屈辱敢抗争成为他性格的另一重要方面。面临恶霸蒋士镛对教育试验的破坏，他疾恶如仇，毫不屈服：“退缩当然不是个好办法！你退缩一步，那力量又进逼一步”，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径直干下去，别的都不管。”这种无所顾忌刚正不阿的斗争精神，来源于他对新事物的坚定信念。在与

金佩璋谈论新文学运动时，他曾说：“哪一个革命运动不受人反对”，“我相信文学改良终于会成为一种思潮……，将冲击到别的方面去”，正是这种信念激励他顽强地抗击黑暗，探求光明，立志革新。

他的这一性格特征，是在与蒋冰如的对比中表现出来的。蒋冰如是一个具有民主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有很大的妥协性。他起初确与倪焕之志同道合，革新教育，但正如倪所分析：在教育界“能定心地干，不再去投网的只有两种人：富有资产，生活不成问题的，是一种人；把物质生活看得极轻，不怕面对艰窘，一心唯求精神的恬适的，是又一种人。”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俩的不同态度，并且随着事态发展越加明显暴露出来。在商量对付蒋士镛的教职员会议上，蒋冰如一开始心头就打退堂鼓，议决妥协后更微露阑珊，急于收场；而倪焕之却义愤难平，心怀痛苦，忍辱不语。后来蒋冰如屈从封建势力拟出任乡董，倪焕之坚决反对，劝他不要“给人家作了善意或恶意的工具”。蒋为逃避大革命风潮不让孩子在上海读书，而倪则坚持“时代的浪潮，躲避是不见得有好处的”，主张让他们去“接触”，“历练”。蒋自暴自弃，甘居“时代落伍者”之列，最终走上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的改良老路。倪焕之和蒋冰如的不同性格特征，显示了他们不同的阶级属性，为我们认识倪焕之的道路和形象提供重要依据。

革命者王乐山形象虽着墨不多，但们象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同化着倪焕之，从而丰富了倪焕之的艺术形象。他把倪焕之从小镇拉到上海，拓宽了他的政治视野，又以自己无私无畏的革命言行给倪焕之以深刻影响。倪对他十分感佩，把他奉为楷模，因而在斗争中他能甘冒苦难，奋不顾身，为了迎接北伐部队进军上海，他终日奔走忙碌，以至于“好几天没有充分

地睡一觉，安适地吃了一顿了”。王乐山形象的塑造，揭示出倪焕之后期思想发展的现实基础和革命性质，是对倪焕之这个主要人物形象的重大补充和有力衬托。

在斗争洪流的冲击下，倪焕之的革命性格显出光彩，同时也使他性格中的消极面得以暴露，这就是他的浮躁偏激，易冲动，欠沉着，热情有余，沉着不足，对斗争的复杂和艰巨缺乏精神准备，顺利时容易自我陶醉，发生挫折后，又往往丧失信心，甚至茫然失措。作为一个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般地比较脱离实际，在他们的理想和热情中，往往带有主观冲动的成分，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正值中国革命的幼年时期，整个革命队伍的素质都比较稚弱。对倪焕之这样的人来说，这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茅盾所说：“主人公倪焕之虽然‘不中用’，然而正可以表示转换期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⑧。我们不能把人物的这种思想缺陷当作本质，把软弱性动摇性当作人物的主流来否定他的基本的革命的一面。

倪焕之性格的二重性和形势发展的复杂性多变相结合，就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个希望抓到手里，一个个失掉了”的希望和失望相互交替的曲折过程。这是否就如有些评论所说是“处于一种回环往复的精神圈子”⑨里呢？让我们看一看现实描写。辛亥革命时倪焕之曾踌躇满志“要做一点事”，但这种一时的冲动缺乏明确的目标，在违心地当上小学教员后便很快感到“哀愁”和失望，觉得前景一片暗淡，“正象这夜晚的途中一样”，其结果是他对政治的淡漠，连报纸也不去看了。后来，他从教育事业中，“看见希望正在前边招手，就开始乐观起来”，明确的希望鼓舞他热烈地追求，坚定地开展教育试验；后因对教育试验结果的失望而离校赴沪，投奔新的生活。

这次的失望不是出于个人出路，而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它造成的直接后果，不是上次那样前行无路，而是看到了更广阔的前程；不是对政治变得冷淡，而是与之结合得更自觉更紧密。五卅和大革命中他怀抱的希望则具有更加明确的政治内容，因而激励他以新的战斗姿态去努力实现它。他在大革命后的失望虽有不少消极因素，但主要仍出于对革命前途的忧虑和对于那帮“比兽类更为兽性的东西”的憎恨，同时，这种希望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他在斗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革命信念：

“真心求真理的心，在我的内心，是比以前更旺地燃烧着！你是江河一样浩荡的水也好，你是漫没全世界的洪水也好，总之灭不了我内心里燃烧着的东西！”可见，他每次希望和失望的内容不同，性质不同，造成的结果不同，达到的思想高度不同。失望、希望反复交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破和立的过程；失望是对矛盾的揭露和对旧事物的否定，而非精神的崩溃，它逼使倪焕之艰苦地思考和探索，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希望必然具有新的内容，这正是不断成熟进步的思想过程，而并非“循环往复”、停滞不全的“精神圈子”。

倪焕之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备受磨难，屡遭挫折，进步和革命的愿望始终不能完满实现。而正是顽固的封建势力扼杀了他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的理想和事业，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最深刻根源。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的复辟，粉碎了倪焕之“以为增进人幸福的政治立刻能实现了”的“美梦”；竭力维护封建秩序的蒋老虎的刁难和破坏，使他的教育试验几乎告吹；最后置倪之于死地的，则是大革命。26、27两章对蒋士镛在小镇上投机钻营打入并操纵革命队伍，进而向革新派蒋冰如反攻倒算的事变过程的插叙说明，正是国民党右派的叛卖和地主阶级破坏的联合，导致了革命的流产。他们一

1002640